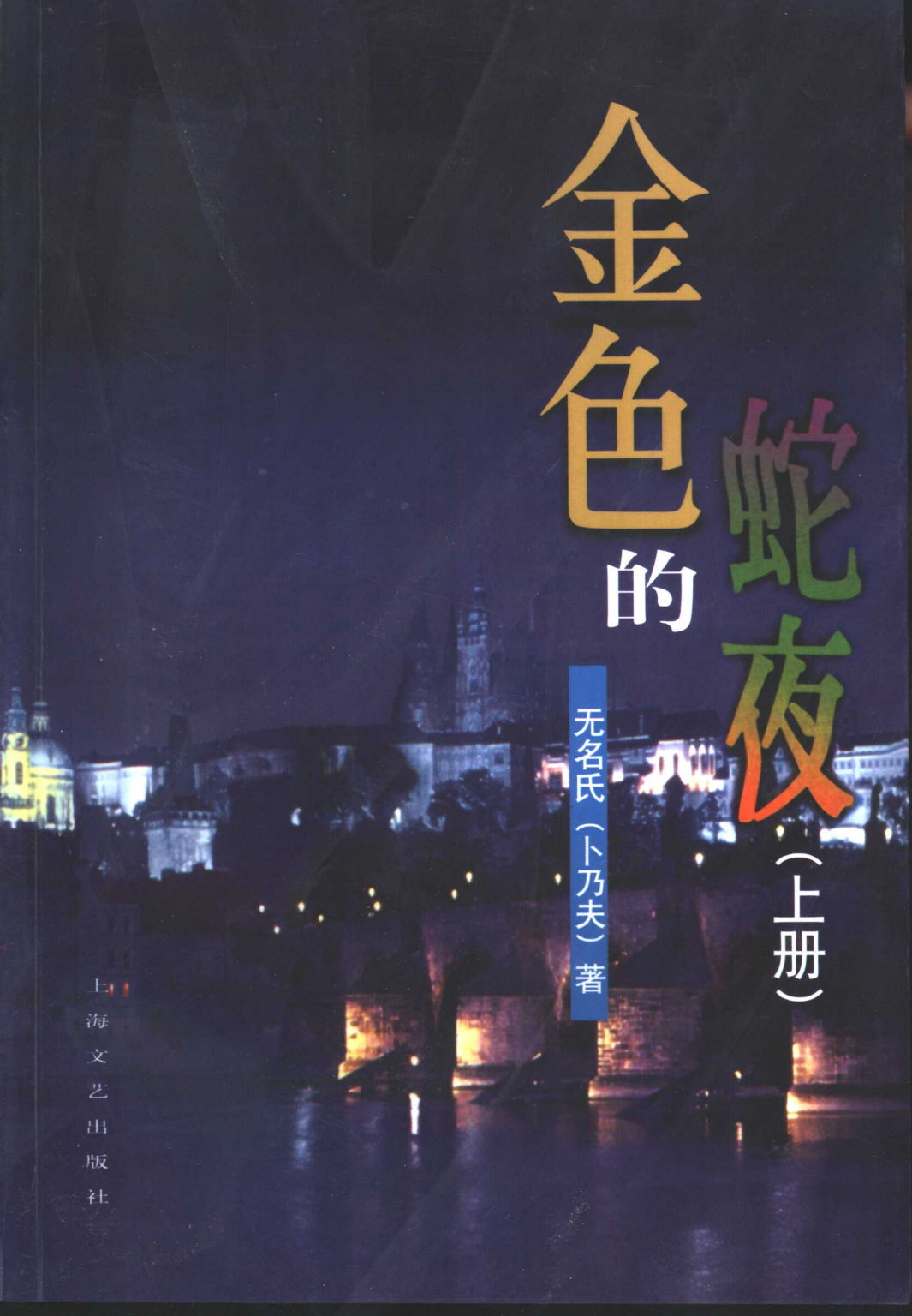




金色 的 蛇夜

(上册)

无名氏(卜乃夫)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无名氏（卜乃夫）著

金色的蛇夜

（上）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权)图字: 09-2001-2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色的蛇夜/无名氏(卜乃夫)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7
(无名氏作品系列)

ISBN 7-5321-2238-7

I.金… II.无…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2955 号

责任编辑:陈朝华

封面设计:麦荣邦

金色的蛇夜

无名氏(卜乃夫)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 插页 4 字数 575,000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100 册

ISBN 7-5321-2238-7/I·1794 定价:39.00 元(上、下二册)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671164

献给这一时代为真理而受苦难，而
不屈，而挣扎，而战斗，而终将获胜的各
民族纯洁灵魂！

——无名氏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又一座丰碑

——《无名书》总序

汪应果

1998年我曾在拙作《无名氏传奇》一书中这样写道：

……《无名书稿》复杂深邃的内容和巨大的艺术探索的独创性工作，是需要时间让人们慢慢认识和消化的。当然，这个时间是可以预期的。

这个时间终于等到了——在新世纪的第一春，这部巨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全文出版了。

自1960年5月3日无名氏为《无名书》画下最后一个句号，到在大陆全文出版，这期间竟然长达四十一年之久。而伴随着这漫长等待的，是这部书的传奇式失而复得的遭遇以及作者的传奇式隐而复出的经历。这里面充满了“左”的肆虐，意的坚守，心的追求，爱的缠绵，仅此一点就足以写出一幕幕令人回肠荡气、欷歔不已的活剧来。而这一切我都在《无名氏传奇》一书中做过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

然而这种等待又并非毫无补偿——即使在中国大陆根本无法看到《无名书》的情况下,过去大陆出版的许多文学史就已屡屡提及此书且做出很高的评价,尽管这些文学史家并不讳言自己未能一窥全豹的事实。我想,一个评论家在未看完作品前就贸然发表意见,这在文学评论上《无名书》也可算是创下了一项“吉尼斯记录”。至于在域外,这部书用“久已享有盛名”来形容,我想也并不以为过了。

这部书之所以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我以为至少有下列几点原因:

第一,《无名书》是一部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不论内容与形式都十分独特的作品。它不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而是一部现代主义的力作。众所周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现代主义实际上已成为 20 世纪文学与艺术的普遍潮流,然而在中国,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相对于世界工业文明总趋势的滞后,以及 20 世纪中国低位文化对于高位文化不停地征服,现代主义文学仅仅在 20 世纪之初,由鲁迅发轫,绵延至三四十年代,陆陆续续绽开过星星点点的绚丽的小花,以后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在被打压的地位,直到世纪之末,才又长出一些仿现代主义的四不象一类的东西来。这样,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与世界先进民族文学相比,就无法产生出平等的对话关系。

我这里绝不想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做高下优劣之分,创作方法本无优劣。问题在于,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到底为全人类的思想宝库提供了哪些前人所没有的思想财富?除了鲁迅等那几位数得过来的真正大师级人物外,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所能供人言说之处实在是少得很。或者不如说,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优势并不在这方面,而是主要集中在提供一整套培育“宣传文学”的经验及范本上。也许它们对于眼下的中国政治现实是

必不可少的,但这于现实主义的真正要求,似乎有点错位。

另一方面,20世纪自然科学思想体系的重大发现,引发西方哲学思想的层出不穷的变革,对人们的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一些过去人们常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比如说“造反”吧,过去人们总习惯地认为,社会出现了不公,人们活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造反”,搞改朝换代,认为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而事实是,中国的历史上,“革命”也好,“造反”也好,都是相当多的,然而不管怎样“革”,也无法创造出一个公正的社会来,所谓“革命”、“造反”的结果无非是克隆一个原先的自我。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从人性的本质高度来重新认识自己,承认人性恶与人性善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秉性,与隶属于什么阶级根本毫无关系。为了创造公正合理的社会,人们应把智慧集中在创造科学公正的社会运作的游戏规则上来。而对人性恶的发现与刻画显然是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对于世界文学宝库所作的重大贡献之一。这也就是说,当中国现当代文学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地探索、暴露中国社会制度的弊端时,现代主义的文学却已经在更高的层面上解读了这个问题。这儿出现的差距显然并不是创作方法上的差距,而是哲学思想的差距。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对于本国的现代主义的作品才应该给以更多一点的关注。

几年以前,我曾参加过一个国际文学研讨会,当我向国外同行们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发现的成果时,一位外国朋友提醒我说,你们所说的一切,在国外的文学中几乎早就谈论过了,这很使我有有点茫然若失。

然而《无名书》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话题,全新的视角,它思索的是人存在的意义,生命的内涵,通过三位女性(翟紫、邬玛丽、莎卡萝),它展现了人的人性、神性和魔性,它更通过全书的

主人公——印蒂对于生命价值的执着探求，刻画了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作家借主人公经历的人生五相——革命、爱情、罪恶、宗教、彻悟，揭示出人性的五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兽欲、爱欲、肉欲、灵欲和升华欲，它们陈陈相因，环环相扣，在对立矛盾中由低级向高级运动，并深刻地思索了这五个人生层次的文化哲学内涵。这显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所未涉及的领域，这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仅有的一部展示“人的心灵史”（无名氏语）的壮丽的长河式的史诗。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由于绝大多数作品都从政治层面来考虑问题，从而表现出中国作家思辨力的贫乏，而《无名书》的出现，则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名书》堪与《浮士德》相媲美。

第二，无名氏又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的代表性作家。从上世纪 30 年代起，无名氏的作品就逐渐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到 40 年代与另一大作家徐訏齐名，被人们称之为文坛耀眼的“双子星座”。如今，文坛老前辈们已纷纷凋零，尚健在者，唯巴金与无名氏耳，况巴老已久卧病榻，绝笔获麟，如今仅无名氏一人，以八十四岁高龄，仍著书不已，其创作之生命力令人感佩！我国前几年出现了一个语焉不清但却十分光亮鲜活的头衔曰“跨世纪人才”，对之多有奖掖。我想，所谓“跨世纪”者，即活过 2001 年关口的人是也。只要是人才的，亦皆应属之，对于无名氏这样一位与巴金、沈从文同时代的超级“跨世纪人才”的代表作，文学史家必然会多多有所关注，而这部书的出版，无疑是填补了一项重大的空白。

就像无名氏本人的经历一样，对于无名氏作品的研究，这些年来在中国大陆也经历了大起大落。几年以前，无名氏的名字还晦莫如深，有的学者甚至为了研究他还丢掉了公职。然而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我国在经济文化方面与世界的进

一步接轨,国人的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文明正大踏步地进入中国。往日不可一世的极“左”思潮,也犹如那夏日的冰山,随着落后封闭的农业经济基础以及愚昧狭隘的小农意识的瓦解而日见其消蚀,无名氏的作品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重新解读。事实上,这些年来。对于无名氏的研究国内正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一批年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正在成为这一研究群体的骨干。我们相信,随着本书的出版,无名氏的研究定将出现新的热潮。

在《无名书》于大陆全书出版之际,我还要再次提起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们的杰出贡献。这里说“再次”,是因为我曾在拙著《无名氏传奇》(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以崇敬的心情说起该社编辑们的高尚的人文品格。我回想起我的几部专著当年出版时的情景,那时候都因为它们在思想上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而被当时的某些人所不容,而每一次都是由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独具慧眼、力排众议把书稿接了下来。这些书后来经历了时间的检验,都得了奖。这一次当无名氏委托我寻找出版社在大陆出版他的《无名书》时,我自然首先又是想到了他们,他们果然又一次证明了自身非凡的眼力,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做了扎扎实实的贡献。

无名氏曾说过一句话:

……最醇美的佳酿,总要在窖里藏个二三十年,让性急的人去采刚种下的花吧,我所珍惜的是最后的玫瑰。

就让这朵玫瑰献给所有珍爱《无名书》的人们吧!

2001年3月

《金色的蛇夜》代序

陈思和

卜老从遥远的地方打来电话,告诉我《金色的蛇夜》出版在即,要我无论如何写几句话作为序言。其实我对《无名书》已经写过近两万字的论文,并且最近在与我的博士生刘志荣先生的对话中,也阐释过自己的想法。想说的地方都已经说过。这里还能补充的一点,是在这六大卷《无名书》中,我最喜欢的是第三卷《金色的蛇夜》和第五卷《花开在星云外》,尤其是前者。现在国内外学界都在热衷于讨论上海的繁华旧梦,大谈海派文学,但我以为,所谓“海派”写上海靡烂之风,《金色的蛇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追根究底,它也无愧为海派文学的老祖宗之一,它至今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似乎是令人奇怪的现象。其余想说的话,似乎以前都讲过,重复是不必的,我将前不久发表在《大连日报》上的一个与刘志荣的对话稿录在下面,虽然是谈无名氏的总体创作风格,也与《金色的蛇夜》有些关连。权作为序言。——思和

刘：大陆读者一般容易将无名氏和他的两本畅销书《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联系起来，也因此很容易仅仅把他当作一个通俗作家，但实际上，无名氏的创作有严肃而重要得多的内容，他的生命大书《无名书》全六卷，包括《野兽·野兽·野兽》、《海艳》、《金色的蛇夜》（上下册）、《死的岩层》、《开花在星云之外》、《创世纪大菩提》，洋洋数百万字，创作时间从40年代中期一直到60年代初期，延续有十五年时间，在20世纪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此，我想请您先谈谈对《无名书》整体上的感受和评价。

陈：十多年前，我在写《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时曾读过无名氏在40年代出版的创作，《无名书》当时只读到了印出的前三种。我当时以法国夏朵勃利昂的浪漫主义创作流派为参照，认为他在很多地方“都流露出那位法国大师的艺术韵味”。一晃十几年过去，又一次读了《无名书》六卷，我觉得还是应该从浪漫主义思潮的角度来讨论无名氏的文学史定位，其后期创作，以完整的六卷《无名书》为代表，艺术境界当在夏朵勃利昂的《阿达拉》以上，更让人想起的是歌德创作的《浮士德》。虽然《浮士德》在中国有多种译本，但这一西方知识分子永无止境的追求精神的象征，在中国的非学术领域从来没有受到过分青睐。对照中国读者在20年代热烈欢迎少年维特；40年代欢迎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接受美学现象。究其根源，不但有东西方文化的传统上的隔阂，也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和广场意识、启蒙立场所形成的思维形态的制约有关。我在十年前的研究论文里就指出过这一现象，西方的浪漫主义只有被改造为抒情传统才能在中国得以传播，郁达夫的抒情小说正好成为这种改造的润滑剂，而《无名书》从夏朵勃利昂式的伤感向浮士德式的探索的过渡，则注定它的寂寞与失宠。以郁达夫为始，以

无名氏为终,这就是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命运。但正是这样一种历史性的空白才能显现出《无名书》得天独厚的价值,无名氏恰恰是跳出上述思维形态的窠臼而别开生面。他的艺术空间不在现实世界而在另一层面,即想象的空间,这也是浪漫主义者世袭的艺术空间。

刘:无名氏在《海艳》修订版自序中说:“流行的写实小说,大多属于社会现实的写真,《无名书》则属于人类情感(过程)的写实,人类(人生哲学)思维(过程)的写真,与人类诗感觉的写实,以及中国时代精神(过程)生命精神(过程)的写实。”这一远大抱负在小说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主人公印蒂的精神追求与升华的过程,这个过程也确实显示出对现代中国的现实和文化困境突围一次尝试,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陈:无名氏的创作摆脱了启蒙的叙事立场,因此他能超越现实层面,直接进入了抽象的文化层面,毫无顾忌地以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实验作为描写对象,这实在太难、太虚、太玄了。至于主人公印蒂,不过是为表述作家观念的道具,《无名书》真正的描写对象是生命文化现象的本相,从最具体逐步上升到最抽象,它们依次是革命、爱情、罪孽、宗教、宇宙五相,以人性的角度而论,经历了兽欲——唯美——虚无——庄严——自然五层,层层上升,层层盘旋,前四相都从正反两面展示其内在的阴阳统一。印蒂每投入一相,都极其严肃地探究其正面的意义,并将其正面意义发挥到极致,方才暴露其负面的意义,然后破除其相,向更高境界漫游。浮士德是从虚无出发,通过对虚无的证明来试验人性探索的永无止境;而印蒂的相反道路是从肯定意义出发,通过一次次的破和立,来证明人性的探索真理的艰巨性。中国20世纪的文学不乏描写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优秀之作,但主要集中在政治层面的寻找,多以现实政治理想为人生意义的终结,而在无

名氏的精神文化结构里,政治理想不过是最低层次的探索,由此可以看出《无名书》的独特追求。我们固然不必以印蒂所谓的终极真理为一定之是,但就其探索过程所展示的艰巨性复杂性,远在一概以启蒙为宗旨的探索之上。

如果说歌德创造了不朽的“浮士德”形象来歌颂人类追求永恒的伟大渴望,那么无名氏创造的印蒂则是这种西方文化精神在东方的回应,尽管这一回应多半含有乌托邦的性质。20世纪中国文化经历了向西方文化的大开放、大接受、大检验的时代,但其最终仍然要落实到自身的更新与发展。如无名氏在小说里所分析的,中国文化的伟大生命活力表现在:“近一百年来,它扮演一只勇敢的蜜蜂,飞入西方花园,吸取百花精英,以便酿制真正东方的佳蜜。”从《无名书》的结构来说,印蒂的生命历程发展到40年代末已经接近“圆全”,前四卷展示的四相,应和了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潮、文艺复兴以来的个性主义思潮、20世纪以来的现代颓废思潮和来自希伯来文化的基督教思潮,经过对这四大西方文化思潮的扬弃以后(也包括对佛教的简易清算),他开始用西方科学精神来融合东方文化,实现他生命的“圆全”。这融合也经过了两个层面,即自然主义的“悟道”和返回人间的实践理想,《无名书》第五卷和六卷展示了这方面的内容。与世界上所有的乌托邦小说一样,作家阐述社会理想的理论有许多不切合实际的空洞可笑的议论,但作为一部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结合的巨作,如果没有这种空洞可笑的议论,就没有它的完整性和完美性。

刘:我刚读完这部皇皇巨著,但对主人公得道的过程与其所得之“道”,还不敢轻易下判断,我感觉这是一部很奇特的小说,判断主人公到底悟道与否,实际上直接牵涉到如何认识作家自己的精神境界的问题,对于评价这部小说,这肯定有很大的关

系。对此我还有点疑虑,尤其因为小说在最吃紧的地方显得薄弱了些。但就印蒂这个人物及其代表的思想追求来说,似乎仍然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中过去所没有的东西?

陈:无名氏已经提供了很多新东西:一位继承了从普罗米修斯到浮士德传统的浪漫主义英雄,一个讨论文化的融会与更新的繁复文本,一部反映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长河小说,这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别具一格的探索。尤其在浪漫主义英雄印蒂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中国式的“圣者”与“魔鬼”的综合性形象。“圣者”表现在他身上有着浮士德那样不知疲倦的探索人生真谛的精神力量,当他全身心地投入寻找真理的所谓“悟道”过程时,他的人格也随着“道”而愈来愈“圣化”,特别是在第五卷《开花在星云以外》中,他超凡脱俗,天人合一,只能从浪漫主义英雄的美学意义上来理解;而“魔鬼”则表现在他是个强烈的反道德主义者,这一形象的出现,促使了无名氏创作风格的转换。在夏朵勃利昂的伤感的浪漫主义风格里,道德的困境正是其悲剧的根源,无名氏早期创作也是如此,但印蒂的出现扫除了小说的通俗趣味,他的强烈的反道德精神冲击了社会的正常伦理习俗的束缚,展示出中国文学里很少出现的魔鬼性格的魅力。真正的浪漫主义英雄都有反道德的性格因素,普罗米修斯偷天火触犯神规,浮士德把灵魂抵押给魔鬼,可以说是反道德主义的旗帜。印蒂对人生意义的求索似可以理解作对天火的窥探,为此他也把灵魂交给了另一种魔鬼,叫作“命运”,从他在青春情窦初开之时,就产生了反叛社会秩序的欲望冲动,义无反顾地离开正常社会体制,以后就一路反叛下去,对事业的反叛、对爱情的反叛、对虚无人生的反叛、对宗教信仰的反叛……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探求真理的方式是“一路甩下去,见山甩山,见水甩水,见火甩火,见金甩金,见星甩星,见月甩月”,终于完成了新型

人格的自我表现塑造。这在《金色的蛇夜》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我们熟悉拜伦笔下的堂璜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对这种浪漫主义英雄的美学趣味不会感到陌生,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由于笼罩着浓厚的启蒙者的道德因素和现实主义的教育功能,连最大胆的反道德主义也只是郁达夫式的伤感多愁的才子型人物,所以,印蒂式的乖戾、强悍、疯狂的性格可能会引起某种令人不适的刺激感,但同时,也会带来新的美学效应。

刘:您能稍微具体谈谈对《无名书》的文体风格及其美学效应的感想吗?

陈:这部书的文体像一座岩浆滚滚、喷发无度的火山,令人目不暇接的壮丽瑰博。这也不是说它是无懈可击的,正相反,火山意象就说明它那种泥沙俱下、泛滥成灾的语言特色,这是一个语言的角斗场,无数鲜蹦乱跳的意象在相撞、拼杀、爆炸。如果单独地看,每一种意象、比喻、色彩、议论,都充满活泼的生命力,但是意象太密,比喻太挤,色彩太浓,议论太杂,一切都变得光怪陆离,创造语言者同时又任意地挥霍语言。语言的生命体瞬息万变,转瞬即逝,造成极大的奢侈。这样一种火山爆发似的语言特色,在中国 20 世纪文学创作中也有人尝试过,如“五四”初期郭沫若的《女神》,当代文坛莫言的小说,似可差强人意,不过郭氏诗歌仅作昙花一现,未成气候,而莫言虽有强烈的感性的色彩声音和想象,却无理性的学识论理和抽象,也难为后继之人。所以,且不论《无名书》的成就高低,仅以它火山型的语言特色,在文学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样的小说文体究竟能在审美上带来怎样的新鲜感受?我想首先是语言上具有强烈的感官刺激,在这里,电闪雷鸣的声响接近噪音,斑斓杂驳的色彩极为繁复,奇奇怪诞的比喻充塞空间,形容无不用其极,感叹无不惊其大,一面是字字均美味羔羊,一面也让人昏迷于冲天膻腥。这种乱

心神、迷感官的文字效应,就仿佛看一场群魔乱舞的原始宗教仪式,或者是在天崩地裂似的摇滚乐里狂舞,身在局外很难想象其中的魅力,一旦身临其境,经昏眩、疲乏、厌倦、刺激的过滤后仍然会有一种震撼。我们读《金色的蛇夜》里关于世纪末的描写,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无名氏的文体、语言有不少让人一目了然的弊病,但我更想指出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的这种历来被人视为大忌的艺术探索精神,在心灵日见冷漠、语言日见枯涩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领域中,仍然是相当可贵的。

刘:《无名书》中自《金色的蛇夜》下册起,是1949年之后作家处于潜在状态下写作的,属于当代文学中的潜在写作的重要内容。潜在写作这个命题是您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提出来的,而且您也从这个角度对《无名书》作过探讨。按照您的解释:所谓的“潜在写作”,指的是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在哑声的年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潜在写作最终还是被公开发表了,只是创作时间与发表时间有不同时性,但其价值和真正意义并不是在发表时间而是在创作时间,显示了创作时间的环境下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多层次的感受与思考。而在当代文学的潜在写作中,《无名书》后几卷也是非常突出的。我想请您以《无名书》为例,谈谈潜在写作的文学史意义。对于这样的新问题,我相信读者一定有浓厚的兴趣。

陈:《无名书》的前两部半和后三部半的写作时间跨越了两个性质不同的社会形态,但皇皇二百多万言的巨著几乎是一气呵成。从1946年出版的《野兽·野兽·野兽》起,整整十五年过去,经历了历史性巨变而能不改宗旨完成一部大书的,无名氏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尤其是后十年的创作环境,对无名氏这类知

识分子是极为严峻的。所以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头上似乎悬挂着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利斯剑的无名氏,居然能如此安心地写完这部书稿,而且在书中几乎看不出那个时代的痕迹?

从潜在写作的角度看,《无名书》提供了一个非常启人深思的个案。无名氏在 50 年代以后身在大陆,却过着半隐居生活,与国家体制没有发生关系,也没有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干扰,而且《无名书》在当时决无公开发表可能,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完全明白这是一部为未来读者写的书,所以对主流意识形态既无故意逢迎亦不特别反对,走的是自己的道路。我选择《无名书》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例子,就是想说明当知识分子失去了自由地发出声音的时候,他能否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追求一份超越现实利益的专业价值。这里所说的“自己的工作岗位”,也就是指人文知识分子的专业领域。在 20 世纪的中国,每个时期都有困扰着知识分子的现实环境,所以常常有人发出“偌大中国安不下一张书桌”的叹息。尤其是时代的“共名”强大到足以制约人文学科的时候,人们会不知不觉地游离专业的价值目标,或迎合或适应这“共名”,理由是希望能急功近利地获得“共名”社会的承认,这样的例子已经不需要再举了。反之,人们受到现实压迫,在疾痛惨怛之下发出抗议的声音,当然是正义的声音,但即使这样的声音,它能否取代知识分子的专业价值?回到文学史的范围来讨论这个问题,作家在失去发表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他能否严格遵循他的艺术良知来尽可能完美地完成他的创作?在文学史上并不缺乏作家在不自由的环境下创作的例子,有明志之书,有血泪之书,也有阿谀之书,但真正潜心苦吟之书,却不多见。50 年代无名氏的《无名书》,60 年代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70 年代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都可以说是难得的几种,这些创作都是在后人难以想象的环境里完成的,但从当时